

【产业经济】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2014《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吴先华, 盛巧燕, 陈易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 本文对 2014《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这些研究涵盖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能源消费与制造业节能减排、产业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经营,以及服务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研讨会主要观点反映了国内青年学者们面对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由“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的现实经济热点,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能源环境政策、产业规制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 中国制造; 中国智造; 转型升级; 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4)11-0082-08

2014 年 10 月 18—19 日,2014《中国工业经济》青年作者学术研讨会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论坛在江苏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56 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单位的 90 位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主编黄群慧研究员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管兆勇教授分别致辞。会议由专题报告会、分组报告会、企业实地考察三大板块组成。

专题报告会分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作“经济‘新常态’愿景下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主题报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管兆勇教授作“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思考”主题报告。第二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副主编史丹研究员作“我国能源需求的驱动因素与节能措施”主题报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胡汉辉教授作“规制研究的新问题:中国特色与扩展”主题报告。专题报告会分别由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勤教授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先华教授主持。

分组报告会设四个会场,分别由吉林大学商学院董直庆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林青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艳莹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立敏教授主持,并由张杰、杜龙政、杨仁发、刘军、简泽、文嫣、陶锋、金帆、唐小飞、李钢、徐礼伯、夏清华、江飞涛、谭

[收稿日期] 2014-10-23

[作者简介] 吴先华(1977—),男,湖北荆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盛巧燕(1981—),女,安徽合肥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陈易天(1990—),男,江苏常熟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洪波、汤吉军、杨兰品、刘永强、李世杰、沈红波、彭本红等作重点评论。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考察了南京(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和南瑞集团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一、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技术领先和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制造业低成本生产的“双重夹击”,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发展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中国制造业长期滞留在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低,专利和标准受制于人,多数行业研发仍处于跟随模仿状态;在发展方式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因此,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必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减轻环境压力,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也成为了本会场的主要议题。与会学者为大家梳理了工业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探讨了云制造与工业 4.0 产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差异,并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新“智造”模式、设立海外研发、并购等逆向研发外包以及改变技术学习战略以期重塑生产价值链等行为都是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思路和突破口。

会议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就“经济‘新常态’愿景下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作了主题报告。他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冲刺阶段。经济增长阶段中的“新常态”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典型特征,同时存在增长速度换挡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特点。因此,在正确认识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中国经济需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融合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措施,来积极应对经济中的“新常态”。他指出目前产能过剩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一种必然现象。产能过剩已经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过剩;从低端、局部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在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工业化后期将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时期,产业升级表现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工业 4.0 时代,中国需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同时,他还特别指出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将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释放更多经济发展制度红利,并详细阐述了改革的路径和突破口:一是从方法论上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将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二是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将国有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为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建立不同法律法规,进而设计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细则;三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混合所有制下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运行规则,积极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由“集中统一管理”转向“分层分类管理”,建立有效的高层管理人员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四是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治理结构规范化和企业管理现代化,从而提升与国有经济交叉融合的能力。最后,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努力完善产权流动的市场机制和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积极创造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等。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王玉教授在《互动创新驱动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企业竞争的新范式、“智造”新模式》一文中对比了国际国内在线定制企业的差距,提出了“互动创新驱动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智造理论模型及其 C2B2P2X 的运作机制,并用在线定制 Nina 鞋的案例说明了所提理论模型及运作机制的应用。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金帆副教授在论文《云制造与工业 4.0 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中指出云制造与工业 4.0 几乎是在同一时代由中国学者和德国政府提出来的未来制造思想。但两者提出的背景与出发点、制造思想的思路以及两者的产业组织模式都不同。云制造更接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本质特点。因此,建议中国应该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未来制造模式,在借鉴德国工业 4.0 战略思想的同时,以云制造为目标制定未来制造业发展战略。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永平博士等在论文《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控制技术进步等诸变量的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在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作用程度按东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强,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技术进步对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虽然为正却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是否显著要视分位点而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FDI 和人力资本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从东到西逐渐递减,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具有基本相似的弱效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喜博士在《知识分工、学习领域与产业领导权——中国企业重塑价值链的案例研究》一文中从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的关系入手,对技术学习战略进行重新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学习领域的概念,阐述后进者的技术学习战略对其技术学习时机与内容的影响,通过三个本土企业重塑价值链的案例说明了积极的学习战略对控制知识分工、领导产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中国工业转型的动力源泉。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岳中刚副教授在论文《逆向研发外包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采用固定效应及稳健性回归分析了海外研发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并购等逆向研发外包三个维度的创新效应,发现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并购对创新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这对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走出去”布局海外研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湖北大学商学院刘和旺教授等在《所有制类型、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论文中采用循环 CDM (结构)模型,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创新产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但是其商业化绩效(人均销售额和人均利润)却显著低于民营企业,说明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市场优势,民营企业较高的企业绩效并非来自其较高的创新效率。

浙江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项莹博士等在《垂直专业化分工视角下中国制造业产业关联统计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中利用 2012 年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关联进行测度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依然主要为中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

二、能源消费与制造业节能减排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人类活动尤其是制造业的能源消费与排放又加速了气候变化的进程,产生了正反馈效应,使得具有“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特征的中国制造业更陷入发展的“环境困境”。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以及政府环境管制等问题得到与会专家的热议。气候变化领域横跨百年的数据证实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消费等活动对自然环境有着显著影响。学者们详细阐述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并指出未来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主要路径。此外,环境管制与产业竞争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评”项目投资、环境危害中的公众诉求效力、产业集聚与产能过剩等研究都为多角度理解当前的制造业节能减排问题提供了有力佐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管兆勇教授首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与大家交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思考”主题报告。他提出,近百年来全球地表气温数据显示地球气候系统正经历着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在比较不同尺度气候变化原因时发现,工业革命之前地球气候变化主要受自然因子的驱动,而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室气体(主要为 CO₂)排放达到历史最高值;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改变以及人为气溶胶的大量排放,其中东亚地区主要是生物质

燃烧产生的碳类气溶胶及硫酸盐气溶胶。管教授进一步指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反过来对天气、冰雪圈、海洋环境、水和能量循环、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以及人类自身健康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气候变化的意义已经上升到影响国家安全和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新高度。同时,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异常事件如何预测、评估和应对成为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他最后强调人类社会必须通过开展风险管理,采取主动适应行动,采用具有气候可恢复力的发展路径、适应和减缓行动以及政府治理措施上的正确选择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史丹研究员就“我国能源需求的驱动因素与节能措施”发表其学术观点。她指出近20年在中国GDP增长率平均保持10%的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消费呈现总量大、增长快的变化趋势,通过KAYA分析法,推断出能源消费总量驱动因素中,人均GDP的影响贡献度远远超过单位GDP能耗和人口的影响,依据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推测,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还将继续攀升,人均能耗峰值还未到来。因此今后两年,中国将面临更严峻的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双控目标的压力。史丹研究员深入剖析了目前制约中国节能减排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产业结构政策并未改变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惯性;市场缺乏高效核心的节能技术装备造成技术节能成效有限;节能减排缺乏融资机制以及严重依赖政府强制目标考核推动,企业缺乏自觉减排行为激励等原因。基于此,她提出以下观点,一是未来几年仍然只能通过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完成主要的节能减排;二是加强技术创新和节能技术推广的力度,各级政府应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R&D经费支出;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扩大节能减排的融资渠道,大力推进绿色融资和建立节能量交易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四是制定更健全的管制与激励措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建立减排激励机制,降低政府的规制成本和企业节能减排的专属成本。最后,她特别强调了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能源消费和生产数据在辅助新能源生产选址、城市电网规划以及提高居民能源消费效率等领域的重要作用,指出借助大数据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节能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少观博士在论文《环境管理对钢铁行业竞争力的影响——中英韩三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中对比分析了中英韩三国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发现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增长迅速,韩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增长较快,而英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出现下滑,认为环境管制力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长期存在正相关关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盛巧燕博士在论文《地方政府存在环境“逐底”行为吗?——基于“环评”数据的实证检验》中采用2003—2012年间的全国“环评”以及“三同时”项目投资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环境逐底”(Race to the Bottom)行为进行了验证,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财政约束下的赤字驱动以及企业内生排污需求驱动是造成全国污染性投资总量增长的双重因素。对比不同经济水平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仍是污染总量的主要来源地,污染性投资金额仍维持高位但增速放缓;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环境“逐底”动机更加强烈,但在大型项目投资上争夺乏力;此外,在三大热点经济区域中,环境自净能力最弱的环渤海地区政府“逐底”行为最为明显。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韩超博士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在论文《环境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诉求:基于城市间交互影响的经验分析》中分析了在地区交互约束下环境规制决策及实施中规制与公众诉求等治理方式的作用机制。结果认为,考虑城市间交互性后,以环保信访为代表的公众诉求并不能带来单位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能带来环境污染指数的降低,其他治理方式中的行政处罚等也未有效发挥作用。此外,考虑城市间交互性后,邻近城市的财政自主度提高将会通过FDI引入等提高本城市的环境达标水平;通过市场化发展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因此,建议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全面审视目前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构建长期健康有效环境治理体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广喜副教授等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计

量研究——四大经济区分析》一文中,分别采用 Tapio 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对 2012 年环渤海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四大核心经济区制造业企业的碳排放脱钩总体状态和空间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各经济区碳排放脱钩情况整体趋好,但丝绸之路经济带脱钩状况最差;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外的其他三个核心经济区的空间效应均显著,且环渤海、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碳排放脱钩的空间依赖性较显著,但在空间异质性方面,环渤海经济圈差异性最大,长江经济带次之,泛珠三角地区最小。在另一论文《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碳排放脱钩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中研究发现,该地区自 2006 年以来碳排放呈现弱脱钩状态。同时,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弹性、经济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速、单位 GDP 能耗是影响此地区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杨仁发副教授的《产业集聚是加剧还是改善中国环境污染》一文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中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范林凯博士等提交了论文《渐进式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及“越管越过剩”的形成机理》。论文采用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建立理论模型论证了钢铁、电解铝等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他提出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三、产业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经营管理

产业规制问题一直是产业经济学领域富于魅力的重要主题。随着让·梯若尔(Jean Tirole)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让·梯若尔及其合作者们在产业规制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性贡献又成为人们重温的经典。在“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的过程中,产业规制理论存在哪些现实指导意义以及制造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有哪些创新是本会场的主要议题。与会学者通过回顾经典规制理论,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文化背景阐述了规制研究在中国产业政策领域可能的扩展运用,并对治理经济发展中不良行为的平台模式、跨国厂商的定价策略等规制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思路。同时,学者就产权制度安排对企业经营效率、融资效率以及要素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基于家庭伦理思想的企业管理理论创新、政府搭建担保平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问题受到了大家的热议。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胡汉辉教授的报告以“规制研究的新问题:中国特色与扩展”为题,介绍了经典规制理论在过去中国产业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指导意义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背景下政府如何规制的新问题。恰逢 Laffont 逝世 10 周年,胡老师为各位年轻学者详尽评述了 Laffont 先生及其合作者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在市场势力和规制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性贡献,重申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中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指导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在文化与科技融合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规制问题面临着社会规制中包含经济属性、经济规制中包含社会属性的复杂状况,从而形成单任务多维规制激励问题,进而导致集中规制还是分散规制的选择难题。主题报告主要阐述了三个结论:一是针对完全信息下的集中规制,因为不存在规制者对成本结构的规制压力调整,因此没有成本分摊问题,从而多维规制激励没有结构方面的扭曲。二是分散规制环境下,不同规制者对文化科技企业的规制取向和规制压力不同,导致企业单任务情况下需要对多维努力的成本分摊比例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因此即使是完全信息,成本分摊也将导致不相等的多维努力水平。规制压力大,成本分摊小,相应的努力水平较大。三是分散规制者也存在竞争效用,进

而造成总的激励强度将超过集中规制下的水平,提高文化科技企业总的努力水平,但从社会福利角度看,此时总努力水平又明显偏高。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汤吉军教授在论文《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一个不完全契约方法》中从契约不完全角度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与所有权配置的重要性,认为对于国有化、私有化还是公私伙伴合作(PPP)等混合所有制来说,简单地实行私有化并不是唯一首选方案,需要在加大资产重组的同时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与公平问题。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世杰教授在论文《零售商服务、制造商 RPM 行为与社会福利——进口汽车价格畸高的一种解释》中基于 Puppe 和 Rosenkranz 的模型,将零售商服务因素纳入理论模型,研究了跨国汽车制造商的 RPM 策略的实施及规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服务提高了产品的零售价,增加了自身的利润,改善了产业生态环境,同时降低了制造商的预期利润,认为规制当局应禁止除无约束建议零售价外的任何形式的制造商 RPM 协议。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谭文浩副教授在论文《产权性质、内部资本市场与现金持有》中,通过对上市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运转行为的分析,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临不同融资环境中配置资金资源的情况。研究发现,非国有性质企业由于缺乏充分的“政治成分”,在外部融资相对困难的情形下,具有更加强烈的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配置的动机,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相对更高,而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是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的重要因素。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飞博士等在论文《初探平台治理的私有管控机制》中认为,平台对于不良行为的治理主要分为公共管控(Social Control)和私有管控(Private Control),其中公共管控主要借助于法律法规,而私有管控更多体现平台自身的作为;相较于公共管制,私有管制具有时滞短、效率高、作用明显的特点,但同时也易遭致反垄断调查。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杨兰品教授等提交了论文《试论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偏差——基于不同类型行业的比较研究》。论文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比较分析了国有垄断行业、国有竞争性行业和非国有竞争性行业三种类型工业的各自主要生产要素回报与其贡献偏离状况和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有垄断行业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偏差,与另两类行业相比,主要要素的回报与其贡献存在严重偏离,甚至完全背离。而降低进入壁垒,提高市场化程度,是调整国有垄断行业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刘永强副教授在论文《市场品与非市场品均衡生产制度的内生机制研究——工作—家庭平衡视角》中,采用内容分析法,发现制度内生机制启动于工作与家庭关系危机和制度危机,提出了以员工家庭与工作满意度均衡和企业市场品与非市场品生产均衡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企业管理制度理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邓子纲委员提交了论文《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权质押贷款模式创新研究》。论文基于搭建政府担保平台、建立集合授信,实现风险补偿、贴息补助、保险支撑及内部质押共享来分散防范贷款风险,提出了一种突破传统产权质押模式的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贷款模式,有效提高了质押率并减少了流程和操作时间。同时,他还提出应从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银行实行承诺快捷程序,责任风险主体责任分化,引入资产评估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及建立完善专利权交易平台等四个方面推进相关政策支撑与后续支持。

四、服务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制造业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趋势。目前,制造业产品正在嵌入更多的服务成分,不仅在质量上不断提高,而且更具技术复杂性和使用上的便捷性。例如,3D 打印已经能够对具备高度物理复杂性的部分制造业产品实现个性化的定制生产。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融合发展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中国智造”的可行途径。在本分会场上,与会学者详细阐述了

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面临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外部环境,分别讨论了贸易竞争力的测度、美国需求侧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 FDI 的区位变迁对中国产业结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产业转移的影响机理和政策启示。同时,企业服务补救的策略与时机、服务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治理以及服务模块化理论等研究都为现代制造业企业提升服务化水平提供重要的指导依据。此外,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跨境电子商务、制造业生产异常管理措施以及众筹平台对创意项目融资的影响等热点问题也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关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立敏教授等运用定量文献研究的 Meta 回归方法,在《在国际化—企业绩效纷纭关系背后:基于 Meta 回归技术的多重误设定偏倚分析》一文中,以企业绩效对国际化的回归系数为效应量,应用 64 篇重要文献中的 176 个样本观测值,从多个层面、多重角度对国际化战略是否有助于企业提高绩效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

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刘林青教授等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贸易竞争力多维评价及发展政策探析——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一文中深入研究了“任务贸易”为特征的新理论研究范式,运用“层级—边际—互赖”的分类来梳理不同维度的研究,构建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竞争力多维评价的诊断性分析框架,分析了不同维度的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政策涵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研究员阐述了《美国需求侧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表明当年价所计算的美国需求侧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小于供给侧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中国一直以来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实力均无法满足大规模输出人民币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条件,因此建议中国目前依然需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西部商学院唐小飞教授在其论文《负面情绪对服务补救的时机和补救策略影响机制研究》中运用负面情绪强度与服务补救策略组合的最优匹配模型,通过满意度、购买份额及其拟合曲线评价了不同匹配结果的效果。该文不仅阐述了负面情绪对服务补救策略影响的内在机理,而且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丰富和延伸,并解读了部分补救行为“低效”的原因,对服务补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扬州大学商学院谭洪波副教授在《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还发现中国的 FDI 以及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为赚取中国工业偏向型的要素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扭曲租”。这些结果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相对滞后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上海理工大学王林博士等在论文《不同行业跨境物流绩效对制造业发展的启示》中以两个市场理论为基础,运用整合型电子商务物流绩效测评模型(UTEC),对比分析了影响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跨境物流绩效的因素,研究表明:跨境支付与法规协调是中国制造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亟待解决的外部条件,为中国制造业的跨境电子商务的战略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詹圣泽博士在论文《基于制造业生产异常及其处置措施的研究》中认为对制造业生产异常响应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方案的设计与构建,提高其处置的及时性、实现异常响应的规范化管理,是企业降低生产及管理成本、完善精益生产管理体系、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不可缺少的环节;并在总结多数制造企业异常处理规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的、普遍适用的异常处理规程。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黄玲博士等运用有效风险投资组合规模模型,在《创业融资、众筹平台转型与中国智造——以点名时间为例》一文中对中国最大的众筹平台转型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平台从综合型项目众筹转向专注于智能硬件类项目众筹是基于历史交易数据分析得出的理性选择,而将众筹的阶段从创意期后移至量产前是针对中国众筹环境尚不完善的被动举措。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颜博士等提交了论文《服务模块化研究脉络、基准与展望——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论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运营和战略方面对服务开发学派(Service Development School)和服务创新学派(Service Innovation School)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梳理,并对服务模块化的研究基准、操作对象、理论空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若干颇具潜力的未来研究方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彭本红教授等的论文《服务型制造项目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研究》,根据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因素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核心制造商、顾客和服务商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核心制造商、顾客和服务商最终会达到监督、参与、努力的稳定均衡状态。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郭进博士研究生等在论文《FDI 区位变迁与制造业区际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中通过建立制造业区际转移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 FDI 区位变迁与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相关关系,发现 FDI 区位变迁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两者均呈现出“东出西进”和“就近转移”两个主要趋势,建议政府遵循并利用两者的转移趋势进一步引导外商投资的空间落位并规范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进程。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蔡银寅博士研究生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制造业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中,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给中国制造业进出口以及投资带来的影响,认为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否对中国实际的影响将无太大差别,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余菜花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再工业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讨论了“再工业化”的由来,分析了“再工业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出口竞争压力增大、高端制造业领域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增多,同时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缩减,但为中国资本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快速增长。

“Made in China” Transfer to “Made with Intelligence in China” —— An Overview of the 2014 Young Scholars Seminar Held by Journal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WU Xian-hua, SHENG Qiao-yan, CHEN Yi-ti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in academic ideas presented in the 2014 Young Scholars Seminar held by Journal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with the topic of from “made in China” to “made with intelligence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searches submitted by the young scholars include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dustry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op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ervice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young scholars in the area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esign, and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form from “made in China” to “made with intelligence in China”.

Key Words: made in China; made with intelligence in China;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L60 O30 Q54

〔责任编辑:王燕梅〕